

索尔·贝娄《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共同体重构

王欣怡 费跃琦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沈阳, 110819;

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反文化运动盛行, 社会层面的精神堕落对传统的共同体意识造成巨大冲击, 索尔·贝娄以犹太传统为基础, 借主人公塞姆勒对这一共同体危机进行回应。首先, 本文从犹太群体面临的共同体困境出发, 批判现存共同体中的不平等现象。其次, 本文以塞姆勒从大屠杀幸存者到都市旁观者、再到暴力事件干预者的嬗变为例, 揭示犹太群体在主流社会中既抽离又融入的矛盾特征的同时, 昭示个体在现代困境中重建共同体的可能性。最后, 本文总结了索尔·贝娄对打破现存共同体困境并通过个体重构人类共同体的期盼, 疗愈犹太民族创伤, 破除文化认同困境。

关键词: 索尔·贝娄; 共同体; 《塞姆勒先生的行星》

DOI: 10.64216/3080-1486.25.11.079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 受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冲击, 社会反文化运动兴起, 极大地冲击着以持久的精神纽带为基础的礼俗社会, 造成了 60 年代美国社会的精神堕落。对此, 索尔·贝娄 (Saul Bellow) 把这一精神堕落的社会诊断为“同情心破碎”。他认为,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人类共同体意识的淡薄, 即维系人类的精神纽带已然断裂。面对美国反文化浪潮, 贝娄没有袖手旁观, 而是试图探讨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他基于自身作为犹太人的离散经验, 在《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通过对犹太群体深陷同化困境的刻画, 反映出犹太民族在现代社会中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地位, 反思现存共同体意识的封闭性, 从而期待一个打破边界、超越种族歧视的未来, 勾勒出世界共同体的愿景, 继而实现真正的平等。

1 犹太人与共同体的暧昧关系: 双重边缘与游离状态

《塞》描绘了二战幸存犹太人塞姆勒在纽约三天的经历。作者围绕着塞姆勒期望加入主流共同体并获得安定感的尝试, 揭示出了犹太人游离于犹太传统共同体与主流共同体之间的双重边缘化现状。

犹太群体的双重边缘化状态首先体现在其游离于传统犹太共同体之外。贝娄书中的犹太人试图通过不同程度的同化努力来获得主流共同体的认可。然而, 这种努力反而导致他们被进一步排斥于本族裔共同体之外,

造成了深层次的身份焦虑与常态化的不安全感。

在《塞》中, 主人公阿特·塞姆勒的早年生活与犹太共同体相距甚远。自小塞姆勒表现出对英国文化的强烈认同, 并作为一个“英国人”生活。六日战争期间, 他以一名美国记者的身份, 与美国人一同旁观犹太同胞的苦难 (148)。这种旁观者的姿态进一步凸显了他与犹太民族的情感距离。他对于自身难以磨灭的“犹太性”产生强烈的不认同感, 无法共情本民族人民遭受的磨难, 也拒绝承认自身无法否认的犹太特征。在长此以往的积极同化努力中, 他们与传统犹太共同体渐行渐远。

除了游离于犹太共同体外, 美国犹太人的边缘化还体现在被主流共同体排斥。受主流共同体的同化引诱, 犹太人相信只要努力同化就能够被主流共同体所接纳。但事实证明, 这一期望难以实现, 因为“一个民族, ……具有不可更改性、消灭性”。(乔国强 11) 犹太人身上与主流共同体格格不入的民族特性使主流共同体感到恐惧和不安, 并把他们视作“公共敌人”加以排斥, 以此来捍卫自己“安全的居民共同体”。(鲍曼 2013, 7)。

塞姆勒长期在英美两国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同化程度相当深远。他的穿着打扮、举止谈吐等都与一名真正的英国人无异。但他与生俱来的犹太身份却使他在大屠杀时期遭受非人的迫害。在经历无数不平等事件后他意识到, “不论多么英国化或美国化了, 却还是一个亚洲人” (122)。在美国化的过程中, 他再三因其无法掩盖的犹太性而被异化为社会公敌。在无数的同化努力后,

他并没有逃脱犹太身份所带来的困境，也注定无法被主流共同体接纳。

犹太人妄想通过同化努力重构与个人发展平行的社会认同，但实际上，在遇到本土白人审视和质疑时，他们将会陷入完全被动的境地。鲍曼在《共同体》中提出，长此以往，他们“既非在群内，亦非在群外”（鲍曼 2013，114）。在屡次同化失败的现实中，他们意识到现存的边界划分阻碍了统一的、本质的人性，（126）并提出构建消除边界、重构平等的世界共同体的主张。

2 对现存共同体的反思与突破

以塞姆勒为代表的犹太人在不断深化的同化努力中开始怀疑同化努力的正确性，并对现存的共同体产生了质疑和批判。

在《塞》中，于英国和美国生活多年的塞姆勒把自己划入“安全的居民共同体”的范围中。然而，难以磨灭的犹太性却无时无刻不给他带来深层的恐惧与不安定感。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在他面对社会中的“他者”时尤为凸显。当他在公交车上目睹一名黑人扒手盗窃时，他立刻把这位黑人扒手建构为“公共敌人”。这一反应不仅源于对犯罪行为的道德谴责，更折射出他试图通过歧视黑人来佐证自己在主流共同体中的归属感。因此，他的第一反应是“对美国白人新教徒很生气，因为他们没有维持好较好的治安”（贝娄 111），并立刻下车打电话报警，以此来捍卫白人群体的利益。

通过对黑人扒手的凝视，他把自己无形的不安情绪具象化为黑人对“安全的居民共同体”的威胁。塞姆勒观察到“这个优雅的畜生英俊、惊人、自大”，脸上“却露出一只巨兽的厚颜无耻”。通过将黑人扒手非人化为动物般的存在，塞姆勒施加了一种隐性的视觉暴力（席楠 122），对以黑人扒手为代表的他者进行主观的负面解读，并转化为具有权威性的话语传达给读者。这看似是为了维护共同体安全，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排斥工具，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凝视本质上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塞姆勒作为凝视主体，承担着沦为被凝视客体的风险。他主动下车报警，却因其犹太身份遭到警察的轻视和嘲笑。另外，当黑人扒手意识到塞姆勒目睹了自己的罪行后，他尾随塞姆勒回到公寓，并强迫后者观看其象征男性气概的器官。

这一行为不仅颠覆了凝视的权力关系，也实现了塞姆勒从主动凝视的主体到被动观看的客体之间的转变。黑人扒手这一无声的反抗打破了主流共同体潜意识中的种族隔离，实现了反凝视抗争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塞姆勒意识到所谓的“同化努力”不过是将“加重他们的恐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使之平息或停止”（贝娄 15）在意识到同化努力的陷阱后，塞姆勒先生感叹“美国！你在世界各处大肆宣扬，你是一切国家中最值得向往、最值得仿效的一个国家”（31）。这一反思促使他放弃二元对立的种族观念，转而将希望寄托于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共同体。

塞姆勒敏锐地察觉到，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已将传统的信念体系污名化为过时且无用的累赘。“人们在今天证明懒散、愚蠢、浅薄、混乱、贪欲是正当的——把往日受到人们尊敬的东西翻了个个”（26）。几百年来对平等与个人解放的追求，最终却使人类迷失在物质的欲望之中。每个人为了自保而不断排斥他人，但却只能加重他们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为了打破现存共同体的霸权主义并实现生命的真正等同，贝娄以塞姆勒为代言人，对现存共同体提出质疑，并进一步关注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体。

塞姆勒在整部作品中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他曾经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六日战争为犹太人带来的苦难。这种持续的旁观行为暗示塞姆勒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所带来的人性泯灭与精神危机，但为了伪装成主流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不愿因不合群显露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在小说结尾处，塞姆勒目睹犹太人艾森用有犹太标志的铁器击打黑人扒手的面部。这一场景不仅揭示了种族暴力的循环与残酷，也暗示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扭曲与崩塌。周围围满了白人和黑人，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他们似乎都在期待一场血腥暴力，以此来满足内心深处的某种扭曲的刺激感。当塞姆勒看见黑人扒手倒在血泊中，他对黑人扒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他把黑人扒手受伤和三十年前自己的眼睛被枪托砸坏这两件事联系起来（299），那种窒息与倒下的感觉与黑人扒手的遭遇完全一致。在这一瞬间，塞姆勒意识到，黑人扒手与他之间并无本质的不同，他的生命同样珍贵且值得尊重。然而，被纳入主流共同体的虚幻希望使他们陷入了相互残杀

的悲剧。艾森, 尽管曾饱受反犹主义暴力的摧残, 此刻却化身为一名冷酷的施暴者。曾经的受害者如今成了加害者, 这种角色的转换揭示了暴力如何侵蚀人性, 如何将苦难的承受者推向罪恶的深渊。

目睹这一暴力场景后, 塞姆勒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所取得的所谓“成果”感到深刻的不适与质疑。此刻, 他意识到这份任务就是对现存的人文道德败坏、造成人类不平等的现存共同体进行批判, 并消解各个共同体中的差异性和不平等。他期望寻求一种“基于平等权利以及对平等权利的关注与责任编制起来的共同体”。这种理想共同体的构想, 不仅超越了种族与文化的界限, 也强调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与责任。

怀揣着对现存共同体的批判, 塞姆勒实现了从旁观者到制止者的转换。他在旁边大喊大叫, 费尽全力把艾森拉走。在这一过程中, 他的种族意识逐渐淡化,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普遍人性的深切关怀。塞姆勒试图揭示现代性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侵蚀, 并提出一种基于平等、关怀与责任的理想共同体构想, 为现代人重构人类未来的共同生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思考。

3 结论

正如索尔·贝娄所说: “小说……促使我们去相信, ……在邪恶面前仍然拒不放手的善, 并不是一种幻觉。”(刘硕良 404) 这一论述表明了文学在揭示现实与探索人性之间的双重使命。现代性带来的后果不仅有“荒原”式景观, 更有对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扼杀。犹太人作为少数族裔的代表, 其困境现状具有典型性和普适性。塞姆勒的反思与行动, 代表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深刻回应, 同时也为构建真正平等的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通过《塞》, 贝娄首先借塞姆勒表达其现代性忧思, 指出应重提被遗弃的旧道德秩序和人文关怀, 以矫正现代性造成的恶果。索尔·贝娄认为, 我们必须从废墟中重建一种生活, 它能够消解各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性与不平等, 并以相互的、共同的关怀填补由差异性造成的空缺, 这正是现代社会中以少数族裔为代表的边缘群体的普遍期望, 也为现代人重构世界共同体

提供了借鉴和思考。

参考文献

- [1] Alan L. Berger. On Being a Jewish Writer: Bellow's Post-War America and the American Jewish Diaspora[J]. 2016, 2(2): 81-95.
- [2] Spencer, Robert. Cosmopolitan Criticism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3] Saul Bellow. There is Simply Too Much to Think About[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6.
- [4] 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
- [5]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6] 齐格蒙特·鲍曼. 现代性与矛盾性[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7] 乔国强. 美国犹太文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8] 索尔·贝娄. 塞姆勒先生的行星[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9] 武跃速. 索尔·贝娄小说中的现代性忧思——从《赫索格》谈起[J]. 江西社会科学, 2014, 14(10): 109-114.
- [10] 席楠. 索尔·贝娄《塞姆勒先生的行星》小说内外的政治图景与反暴力主旨[J]. 国外文学, 2019, 19(1): 121-159.
- [11] 翟乃海. 犹太流散文学中的共同体想象及其表征[J]. 外国文学研究, 2023, 1: 43-54.

作者简介: 王欣怡(2001—), 女, 汉族, 辽宁省大连市。硕士研究生在读, 东北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费跃琦,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